第一章　先秦山东散文

第一节　概说

先秦时期的山东散文产生极早，成就甚高，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处于领先发展和特别昌盛的地位。

说山东散文产生极早，是指我国现存最早的散文篇章成文于山东，那就是《尚书·盘庚》之上篇。《尚书》是我国上古文献的结集，也是我国最古老的散文集。在《尚书》所含的虞、夏、商、周四书中，只有商、周二书是当时留存下来而非出自后人追述的可靠文献，而商书中最早也是《尚书》最早的篇章则是《盘庚》。作为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叶商代中期写成的真实记录，《盘庚》的内容是记商王盘庚为迁都而对臣民的训话。其本事就发生在商都奄。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南庚“自庇迁于奄”，其后盘庚王又“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奄又称商奄，其地地望，据考在今山东曲阜，曲阜城东有奄城；也有说奄在其他地方的，但都未出山东地界。《盘庚》有上中下三篇，据各篇的开首文句及文章本身看，其所写迁都事件的顺序，正如宋人金履祥所指出的：“上篇欲迁之前，中篇将迁之际，下篇迁徙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① 近人杨树达、孔昭声、杨筠如、郭沫若、蒋善国诸家都大体证成此说。因此，至少《盘庚》上篇的本事发生在山东。

散文是运用文字的艺术，是随着文字体系的形成而产生的。殷商甲骨文迄今为止差不多都出土于殷墟小屯，但如此成熟的文字却并非是在殷墟一地和殷商后期百多年间就能创造出来的。应当说在商人居奄之时甚至更前的时间商代文字即已被创造出来。考古发现，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其陶尊上就已有几十个图像文字，说明古文字的创造早就开始了。历经一二千年，至商代中期盘庚居奄时文字已较成熟是在情理中的事②。况且我国素有重史的传统，史载商王朝建立之后已有史官立于王侧记言记事了；这也绝非是无稽之谈，出土的殷代甲骨上就有多种史官的名目。盘庚迁都非一日之功，三篇文字未必是迁殷后一气呵成，自应是史官在有言必录的原则下先后在两地记录下来的，就是说至少《盘庚》上篇应记录于在奄之时。又《尚书·多士》载“殷之先人，有典有册。”“殷”即商，“先人”即先王，殷商先王的“典册”恐怕主要不是指已出土的甲骨卜辞，而是指《盘庚》这样的较完整的文献。由此也可以推知《盘庚上》成文于奄。

当然《盘庚》上篇和《尚书》中的其他文章一样，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改动，已不尽是原貌，但其基本面目无疑仍然保留下来。此文是记言之文，首开了《尚书》记言为主的体例，遂成为后世记言文之祖。尽管它语言艰涩，诘屈聱

①《尚书表注》。

②据山东大学考古队简报，近年在济南地区有甲骨文出土。其地距古奄地不远。

牙，与《春秋》、《论语》以下的文言文有诸多不同之处，但其篇制完整，已是初具规模的文章。文中为了增强训话的说服力而运用的多个比喻，也都新颖贴切，对后世文章记言议论注重形象化、避免抽象说教，很有启示作用。

本文开头说先秦时期的山东散文成就甚高，主要是就春秋战国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散文，尤其是具有垂范意义的作品，多数出自山东地区的作者之手。可以说，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山东散文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先秦散文的高度成就。

山东散文的昌盛，是“齐鲁文化之邦”的产物。齐、鲁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在自远古至上古的东夷文化、殷商文化和周文化的熏陶下，至春秋战国融会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新质文化。春秋至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也是奠定我国思想文化传统的黄金时代。而“齐鲁文化之邦”既是我国思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又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中心。其标志乃是鲁国孔子由讲学而展开的学术活动和齐国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

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其划时代意义在于最终导致了王公贵族官学垄断的解体和文化教育向民间的下移与普及。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成为战国“九流十家”的先导，经他讲述、整理及修撰的“六艺”诸书，成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文献。而出其门下数以千计的儒家弟子，则成为战国社会舞台上最为活跃、最富于文化创造的阶层——“士阶层”的最早来源。一枝独秀的儒家学派，随着学术的传播与争论，其内部分化为不同的派系，并最先在鲁国衍生出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学迅速发展，在战国成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儒墨的相互辩难，则首开百家争鸣的风气。从此新学派络绎创立，

新学说持续争鸣，蔚为风气，学术文化辐射到中国各地。故追本溯源，战国士阶层和诸子百家的产生与发展，皆与孔子的讲学及其儒家学派不可分割。

诸子百家是士阶层中的文化精英，而鲁国儒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则是精英中的巨擘。他们立足现实，高扬理性精神，以匡时救弊的热情发愤著书，精心结撰，其结晶便是各体著作的相继问世。

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宫以其巨大的规模和成就，使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中心由鲁国移向了齐国。齐国文化传统一向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至田氏立国之后，更加礼贤下士，不惜重金，高位以罗致和厚养人才。自田齐桓公（公元前 374 年一前 357 年在位）设立学宫，至战国末期百多年间，各诸侯国学者贤士纷纷荟萃稷下，极盛时达到“数百千人”①。诸子百家自由地讲学著述，争鸣论辩，盛况空前，稷下学宫遂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文化重镇，从而涌现出硕果累累的著作。

先秦时期没有纯粹的文学散文，各类学术著作如历史著作、诸子著作、兵学著作和经书传解等，皆散文之本体所在。学术著作的昌盛也就是散文的昌盛。明乎此，则齐鲁散文兴旺发达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先秦历史散文，传至今世的代表作品，公推《春秋》及其‘三传’特别是《左传》,以及《国语》、《战国策》和《晏子春秋》。就中除了《战国策》之外，皆出自鲁人、齐人的修撰。而《战国策》的最初作者，盖为战国时的各国策士，其中自然含有齐鲁人士的手笔。诸子散文的代表作品中，《论语》、

①《史记·田齐世家》。

《孟子》、《墨子》皆为齐鲁学者或其弟子、后学所著。《荀子》作者荀况虽系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并接受了孔子学说，其一生大半时间都是在山东度过的；他后半生家于兰陵（今山东苍山），老于兰陵，其著作也是在兰陵结撰的。故山东实为荀况的第二故乡，荀况实为山东散文的杰出作者。而庄周[①]地望，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也是山东。史载庄周为“宋之蒙人”，“尝为蒙之漆园吏”。《史记》三家注唐张守节正义已引《括地志》注明蒙和漆园都在“曹州冤句”，即今山东曹县一带。不过因庄周地望有歧说，为了慎重起见，本书才略去不论。

齐鲁散文在春秋战国时期大体可分作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的多部鸿篇巨制都对中国古代散文起着里程碑的作用。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之际。历史散文中孔子据鲁史以及齐史等列国史乘编纂而成的《春秋》，开创了私家著述的新时代。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②]因而变《尚书》的记言形式，创为编年记事之体。它“书法”谨严，字含褒贬，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并提供了记载事件的样式。但《春秋》文字过简，于是与孔子并世而稍后的鲁人左丘明乃以《春秋》记事为纲，博采当时官方史料和孔子为弟子讲《春秋》而“口授”的一些史料以及民间传闻轶事，撰为《左传》。《左传》变通古法“言、事相兼”，具体记述了春秋时期列国间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史行事，以“书法不隐”的实录原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在文学上，其叙事状物、镂刻人物、语言表达和结

①作《庄子·》。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构布局诸方面，较之前代篇章都焕然一新，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散文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左丘明的另一贡献是在编撰《左传》之余，汇集多种史料，“又纂异同为《国语》”①，故前人乃以《左传》为《春秋》“内传”,视《国语》为“外传”。《国语》在体例上另辟蹊径，创为国别史，分别记载西周至春秋末年的八国史事。这种体例，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策》，而且对后世纪事本末体历史散文以及人物传记也颇多启发：“分八国各为卷，是亦一国之本末也；其传一人之事与言，必引其后事牵连以终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② 《国语》重在记言，其“文辞高妙精理，非后世操觚者可及”③。

诸子散文的开山之作是由孔门弟子“相与论纂”而成书的《论语》，时值春秋末年、战国初年。《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创造性地运用语录体、格言体的形式，较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和生活风貌，再现了一个雍容大度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形象。《论语》的语言简炼含蓄、幽默风趣而又口语化，长于运用各种语气词表达说话人的思想感情；且对前代《尚书》的古奥言辞已革故鼎新，语言上有了质的差别，从而标志着我国行用两千余年之久的书面语言即文言的产生。《孙子》又称《孙子兵法》，为春秋后期齐人孙武所撰；因有后人的加工润色，其成书要晚于《论语》。孙子是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与孔子大略同时而又被后世并称为文武二圣人。此书是他杰出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光辉总结。《孙子》

①《汉书·司马迁传赞》。
②韩菼《左传纪事本末序》。
③黄省曾《五岳山人集》。

亦为语录体散文的杰作，宋人黄震说：“若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① 书中说理议论，不仅精辟而富有概括力，且篇篇围绕中心展开，在文章的组织形式上，比《论语》更有条理性，显示出语录体散文的进步。

第二阶段在战国中期，历史散文含苞待绽，诸子散文继续兴盛。其中《孟子》一书是邹（今山东邹城）人孟轲与其门弟子齐人万章等共同撰著的。孟子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该书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理论。他的“仁政”理论主张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其中的“民贵君轻”尤为精华所在。《孟子》因系记录孟子的谈话，故前承《论语》仍为语录体，但承继中有明显的发展，已演化为对话式论辩，且多有长文宏论，诘难解答，鞭辟入里，表现出向论说文过渡的趋势。孟文充满气势感情，文风体现出战国中期纵横辩说的特征和作者的个性色彩。孟子“长于比喻”②，又是最早运用寓言说理的作者之一，并使寓言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墨子》是鲁国人墨翟及其墨家学派的言论汇编，由墨翟门人及后学编纂。墨子活动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而其书的结集编定却并不早于《孟子》。《墨子》宣扬兼爱、非攻、非乐，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其文风也相应地追求“意显而语质”③，在诸子中别具一格。《墨子》之文仍以大量标有“子墨子曰”的讲学语录形式出现，但语录的段节已讲究内在的逻辑关系，且围绕同一个论题反复作推理论辩，已初具专题论说文的性质。

①《黄氏日钞》。
②赵岐《孟子题辞》。
③《文心雕龙·诸子》。

第三阶段为战国中期以后至战国末年。这一时期齐国稷下成为诸子百家在学术上争鸣、交流的中心，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散文著作。其中“三为祭酒（学长）”“最为老师”的荀子是儒家文化、稷下文化造就出来的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礼法合一”政治思想体系，为后代统治者所服膺。《荀子》一书大部为其自著，肇始了战国末期学者独立撰写著作的新阶段。作为散文，《荀子》已摆脱了语录的简单连缀，也不再局限于对话体的辩说，而是围绕中心进行专题性探讨。荀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讲究逻辑和修辞，又多为鸿篇大论，标志着先秦论说散文的成熟。另外，作为散文领域特殊形式而在汉代蔚为大观的赋，也是荀子最先创作出来的。

成书于齐国稷下先生的《晏子春秋》,前人多归之于四部分类中的子书类，时下的文学史亦多作为诸子散文对待。其实它是子书而“史”言，更含有史书的成分，较之《左传》、《国语》,可称为准史书,应当隶属历史散文领域。此书通过记载齐相晏婴的行事，主要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勃兴的“民本思想”，也表现出礼治与法治兼用以及薄敛节用等思想主张，很有讽世意义。在文学史上,《晏子春秋》的突出成就在于第一次以全部篇幅集中描述了一个人物的形象。它围绕晏婴的生平活动，通过记述重大事件和许多逸闻琐事，刻意揭示出晏子的个性和诤臣品格。相对于《左传》、《国语》而言,它的写人意识有空前的提高，并表现出独特的成就。因为《晏子春秋》有颇多的非信史成分，写人叙事不具有连贯性，故也不能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称之为“传记之祖”。它以传记资料汇编的形式成为《史记》之前的传记文学雏形状态。同是出自此期稷下先生之手的《管子》,虽是一部以法家为主而兼容其他学派思想的子

书，但收有丰富、珍贵的史料和不少传说、故事。其中的《大匡》篇,历叙齐桓公的即位和称霸事迹,较之《左传》、《国语》所载更为系统，几乎等于一篇简明的《齐桓公本纪》；而《小匡篇》也比较全面地记载了管仲相齐的主要事迹，反映了这位大政治家一生的大致经历，也近似于一篇粗具规模的《管仲列传》。凡此都见出齐鲁散文在传记文学孕育和创造上的贡献。

以上所揭橥的三个阶段的山东散文代表作品，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我国先秦散文的总体发展盛况和高度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国其他地区的散文总体上皆不足以与山东散文比肩抗衡。山东散文无疑是我国先秦散文当之无愧的前驱、坐标和梁栋支柱。

还有，先秦时期的山东散文数量之多亦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汉书·艺文志》也未能括尽。除上面述及的以外，还有许多“经书”之文、诸子之文、兵家之文传至今世，仅成就可观的就不下十余种。其中不乏在思想观点上震古烁今，在艺术上不同凡响，连后人都自叹弗如者。如孔子及其儒家后学据《周易》而撰述的《易传》（又称《十翼》），张扬《易》之幽眇，使之从卜筮之书一变而为孔门哲学经典。《易传》已是具有相当水平的哲理散文，所含的《文言》篇以多用韵散结合、平仄相间的优美文句，被誉为“千古文章之祖”①。公认战国时齐人所作而后编入《周礼》的《考工记》，则体现了精辟的自然科学原理，是独特的科技散文。此书相应地以说明文形式出之，有“刻画无若《考工》’② 之誉，实为后世这类文体的鼻

①阮元《文韵说》。
②刘熙载《艺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祖。《礼记》中鲁人檀弓所撰《檀弓》上下两篇，由七八十个小故事和人物对话组成，涉及社会生活内容颇广泛，文笔矫健,意趣横生,其中的《杜蒉杨觯》、《苛政猛于虎》、《曾子易箦》和《不食嗟来之食》等皆为千古名文，在选择细节刻画人物情志上并不逊色于《左传》、《国语》。《礼记》中还收录了由孔子高足曾参所作的《孝经》、孔子之孙孔伋（子思）所作的《中庸》，后皆成为封建时代治国修身的必读书；两文都写得辞浅义深，通畅明白，又条理井然，颇见章法。

战国中后期，分别由齐人公羊高和鲁人穀梁赤“口授相传”而著之竹帛的《公羊传》、《穀梁传》，与《左传》并称为“春秋三传”。二书皆以解说《春秋》“微言大义”而著名。前人对二书中的所含的叙事之文和一些民间传说、异闻逸事也有较高评价,称赞说“:叙事如画,摹写如睹,读之津津然解颐。”①

战国时期齐鲁兵书层见迭出，如曾为孔门中曾参之弟子的卫地（今山东曹县北）人吴起著有《吴子》②，后人以之与《孙子》并称；孙武后人，生于阿、鄄（均在今山东）之间的孙膑著有《孙膑兵法》田齐威王时成书的《太公六韬》、《司马穰苴兵法》，则是齐人分别据齐国始封君姜太公吕尚和春秋后期齐大夫田穰苴的谈兵文献及传说而整理编撰的。这些兵家之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文体上有语录、对话、专论，也有记叙，多种多样；用语多通俗浅显，修辞颇见功力，有不少描述生动、颇有情致的文句，能传达出口气和神情。

还有战国时稷下学者齐人尹文撰著的《尹文子》，表现出

①张宾王《周文归》。
②《吴起兵法》。

以名家为主，综合道法诸家的思想特征。刘勰称赞说：“辞约而清，尹文得其要。”① 《尹文子》之文遗存不多，却留有十余则讲名实关系的寓言。这些寓言“长譬广喻”，“各极其趣”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山东散文中寓言不足的缺憾。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丰富多彩的山东各类散文，在思想和艺术上虽有差别，但在中国散文史上却如同辉光各异的日月星辰，永远闪耀。而因篇幅所限，本编在各章节中不能对先秦时期的山东散文一一论列，只能择要阐述。

第二节　历史散文（上）

一、《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史著作，它是春秋末期鲁国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的，并很早就被列为儒家基本经典（“六经”）之一。由于《春秋》文辞简省，含义深微，理解起来易生分歧，因此陆续有人进行传述即讲解，并逐渐形成了著作，这便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左传》出自与孔子同时的鲁人左丘明，后二者分别出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和鲁人穀梁赤。“三传”都采用编年史的体例，而所记内容、主旨、表达方式和文字水平均有区别。从历史散文方面说，其文学性更是大不相同。

①《文心雕龙·诸子》。
②《二十九子品汇释评》。

（一）《春秋》

中国是一个很重视历史文献的国家，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即已设置“载笔”的史官。甲骨文中的“史”字据考是指以手持册者，故《尚书·多士》说“维殷先人，有典有册。”进入周代，《周礼》中更载有多种史官的名称。史官记事记言，修著史书，形成传统，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讲的：

>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这里所说的《春秋》是泛指，本为当时各国编年体史书的通名。东周时代，各诸侯国由于认识到史书能提供历史经验，有助于“资鉴”和“风教”，纷纷建立国史以记录本国并互相通告和记载他国的大事，且多称这类国史为《春秋》。春秋末战国初的墨子就声称“吾见百国《春秋》”[①]。《墨子·明鬼篇》又曾具体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当然，列国史书也有其他异称，但鲁国史书似乎专称《春秋》，由《孟子·离娄下》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和《左传·昭公二年》所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等语可以推知。那么，鲁国和他国为什么常以“春秋”二字命名自己的编年史呢？据近人于省吾先生考释，这是取春秋代序为一年的传统习惯使然。他发现殷代甲骨文中只有春秋而无冬夏，最古老的记言史书《尚

① 《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佚文。

书》28篇中也无冬夏之名，故文献中多以春秋二时代称一年。划分四时始于西周末，东周春秋时期四时划分已经明确，而列国编年史仍沿用“春秋”标称①。

“百国《春秋》”虽繁盛一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经过秦火焚烧后，便荡然无存。惟有鲁《春秋》因“曾经圣人手”，即经过孔子的润色加工，“勒成删定”，由儒生保存传世，成为今本《春秋》。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伟大的史学家。“孔子是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②，他删《诗》、《书》,定《礼》、《乐》,史籍早有记载 而据鲁史修《春秋》，将国史变为私家著述，前贤记载更是屡见不鲜。早在《左传》中便不止一次地提到，如其“成公十四年”传文以“君子曰”的方式评：“《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的“圣人”，即指孔子。其后的古本《孔子家语》佚文、司马迁《史记》的《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序》等也都一再说孔子“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乃因史记作《春秋》，“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所言“修”、“作”、“次”等字，据考其实都是整理编纂，增删修改，即通过“笔、削”，赋予旧史料以新的内涵，而非如孟子所谓的“作”即今语的“创作”。尽管孟子的“孔子作《春秋》’③ 说对后世影响甚大，但却与孔子自己讲的“述而不作”④ 明显矛

①《历史研究》，1961年第四期。
② 朱自清《经典常谈》。
③《孟子·滕文公下》。
④《论语·述而》。

盾，又不合于《春秋》的实际情况。《公羊传·庄公七年》的传文就明确记载了孔子修《春秋》时对鲁史旧文的改动：

>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所谓"不修《春秋》"，是指鲁《春秋》的原文原句，令人不知所云。"君子修之"是指孔子修《春秋》的加工修饰，"星陨如雨"简洁明白，切合事理。又如，公元前559年卫国大夫孙林父、宁殖驱逐卫君出境，此年的"诸侯之策"（国史）便书写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意思是二人犯上作乱，逼君出走①；孔子则在《春秋·襄公十四年》中改为"卫侯出奔齐"，言下之意是卫君被逐乃咎由自取，孙、宁二人实无罪责。由此可见，孔子的确对鲁《春秋》等史策旧闻进行了一番改造，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史记》关于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和"论史记旧闻，……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等记载，言之不虚。晚世的学者亦有人推测孔子未曾修《春秋》，但不能令人信服，这里略而不论。

《春秋》按鲁国十二个国君在位的顺序编年记事，记载了自隐公元年（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间的主要史事。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祀、盟会等典礼，国君的嗣立、婚姻、丧葬，各诸侯国间的交往和聘问等事宜，以及大大小小多至七百次的军事冲突，其内容广涉各国的内政、外交、战争。另外，书中对日食、地震、山崩及水、旱、虫、火之灾也很注意记录，反映了古人同自然界灾异斗争的情况。总之，《春秋》称得上如前人说的"一代之史"。

①《左传·襄公二十年》。

那么，孔子编撰“一代之史”的目的何在呢？这可以用前引《左传》中的“惩恶而劝善”一句话加以概括。从近处小处说，是他以《春秋》作为私学教材，通过书中所记的史实教授弟子进行当代史的教育，以便弟子们能够把握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褒贬的标准。从大处远处说，是他用《春秋》所载的历史变迁惩罚那些乱臣贼子，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求“拨乱世而反诸正”①，恢复正常的理想的社会秩序。孔子生当周室衰微之际，目睹天下礼崩乐坏、诸侯篡弑的局面，痛心疾首，他希望推行自己提出的以“仁”、“礼”为核心的学说治国平天下。为此他不辞劳苦地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结果没有一个诸侯能善始善终地礼遇孔子，更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他晚年终于意识到，自己仅有的余力只能用编纂史书即修《春秋》总结历史经验的形式来正定名分，向人们提出辨别是非善恶的准则，使“乱臣贼子惧”②，从而实现用王道治国的理想。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更通过作者与时人的对话揭示了《春秋》的旨意：

>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董仲舒）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

①《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②《孟子·滕文公下》。

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文中强调“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可谓深察孔子之本意。

《春秋》宣扬王道、推崇礼义以惩恶劝善、挽救人心，是通过“属辞比事”表现出来的，故《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谓“属辞”，指遣辞以命意，道出了《春秋》语言运用上的特点；“比事”则指排比史事以成文，是指记事上章法严密。在语言运用上，《春秋》用字考究、精审，一字不虚下，如全文起始的“隐公元年”在“夏五月”下记郑国事云：“郑伯克段于鄢。”虽只六个字，却都经过了精心推敲，字字皆有潜在的含义。对此，《左传》解释说：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这是说，直呼郑庄公之弟段（共叔段）的名字，是斥他不尽弟道，目无君上，妄图篡位；不称郑庄公是贬他失教于弟，表明他有蓄意打击弟弟的用心。类似的特意用字属辞，在《春秋》中多不胜数，如书中只称周君为王，对吴、楚之君擅自称“王”，则贬之曰“子”，以彰示反对僭越并暗寓尊王攘夷之意。前人称《春秋》“一字含褒贬”，就是指它能用最少的文字表达出对事件性质、人物善恶的基本看法，如同是记载杀人，杀无罪者称“杀”，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则称“弒”。记载战争或军事行动，潜师掠境为“侵”，攻进都城为“入”，声罪讨为“伐”，两军相接为“战”，毁灭宗庙社稷为“灭”，等等。

如此以一字见真相、寓褒贬的语言特点，后世誉之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种笔法，对历代散文创作追求言简意丰、凝炼谨严而又含蓄蕴藉，影响既深且远。

《春秋》“属辞比事”,变《尚书》的记言之体为记事之体，也具有开创意义。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① 认为与其以抽象空洞的理论进行说教，不如写出实际的人事得失更为切实有用。表现在《春秋》中，就是全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寓褒贬，别善恶”。这既显示出孔子鲜明而自觉的历史意识，也无疑是我国古代叙事性历史散文的萌芽发端。后来的叙事散文几乎都一以贯之地恪守此道并加以发展，都注意史实、事例的叙写，而不是仅以某些例证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春秋》又为历史散文著作提供了简明而严谨的记载事件的样式。书中编年记事，按照时间顺序排比历史事件，记事方式基本做到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②。如《春秋·文公二年》便如此记事“: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区区三句话，将何年、何季、何月、何日在何地发生何事，以及何人参与、结果如何，都做了简而有序的记述，概括力很强。《春秋》还提供了叙事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方法，其中《僖公十六年》的一条记事常为人们津津乐道：“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于此下解释说：

> 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引。
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